



湖北加油！



2月10日，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，医护人员在询问患者病情。

没有办法住院，他们内心的焦虑、压力你都能感同身受，可以说是走投无路。

一个大学老师，她的老公和父母都已经感染了，好像父亲已经去世了，她自己也高度疑似。在封城的情况下，她半岁的孩子谁来带？她发出的求救之声多么悲哀，已经不是救她的命，而是谁来救他们的孩子的问题了。

看见的听见的全是生离死别啊！

我很反感一种说法：“武汉按下了暂停键。”这是暂停键的问题吗？好像恢复了暂停键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似的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，我去过汶川，我的一个巨大的感受就是：创伤将永远停留在它遭到创伤的地方，一辈子都无法弥补！

本来确实打算写点东西，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。尤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：殡葬车在前面开，一个小女孩在后面跟着喊着妈妈妈妈。看到这个视频，我就受不了了，我的心特别乱。我所在的小区比较大，有一天我还听到一个中年男子在喊妈妈，那天又下着雨，真是“昔日戏言身后意，今朝都到眼前来”，它迫近得太厉害！那天以后我的心都是乱的，也没法写作，也读不进书了。

我认识的朋友染病的越来越多，所以接到的求救也越来越多。我的同事、熟人，不管是疑似还是确诊的，我尽可能帮他们做做协调：怎么样能上检测，怎么样才能住进医院。但是前几天还有些医院的朋友可以帮帮忙，这两天根本就不行了，连医院里的医生、护士自己得病了都住不上。这真是真实的绝望。

我倒没有那么矫情地说什么“写诗是可耻的”，但确实，个人生活和个人内心的一道分水岭已经产生了，所以你很难再像过去一样生活。

我有些医护朋友，我每天都和他们聊聊天。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，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，他们自己缺防护服，防护服根本不敢脱。湖北省红十字会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，但是协和医院缺防护用品是千真万确的。有一天，她中午给我发了个微信语音，说她女儿在北京没有口罩，问我能不能帮忙解决。我也没办法，我是有口罩，但是我也寄不出去。后来我就叫我的朋友，几个几个的口罩给她女儿寄过去。至于红十字会的情况，我也是通过朋友圈了解到的，真实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，但它至少影响了我一个选择，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，唯一能做的可能也就是捐助一点钱，那现在我肯定要重新考虑我的选择。

加缪《鼠疫》我经常读，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通过一部小说来认识一个民族的处境。我觉得我们当前的问题都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被展现被揭露过。我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，双黄连可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出来后，网上一下子冒出来很多嘲笑购买双黄连的人的智商的各种段子，我看完以后特别愤怒！你和他们难道不都是可怜人吗？嘲笑他们，你和那些吃人血馒头的人有什么区别呢？嘲笑一个和你一样悲惨的人，和鲁迅先生笔下批判的人们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
我们如何通往自己的现代性，固然跟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关，更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里面具体的人有关。我们每个人都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了，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做好自己这个人，否则就是几千年的悲剧不断循环往复，事实上，像这样的事历史上一再重演过。

宁浩导演很担心我，每天都会和我通电话或者微信联络。我记得当初拍《疯狂的外星人》的时候，大家还说，中国人是我们拍的这样吗？为什么不去拍《战狼》这样的电影呢？《疯狂的外星人》本质上是通过科幻的外衣来反思中国国民性的一部电影。它还是走在鲁迅先生所开创的道路上，刻画人物的时候，我们脑子里想的，就是这个人物的身上有没有阿Q的影子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要重新从鲁迅出发，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，无论在灾难之中，还是在灾难之后。我觉得经此一劫，它可能成为中国作家重新出发的一个起点。

很多作家在写目前的灾难，但我写不了，就算要写，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静和理智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：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，就是反思灾难。在这样一场灾难中，如何保障人的尊严、人之为人的根本，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。■